

中國和葡萄牙： 如何通過澳門構建中葡相互認識*

何思靈**

神話與現實

東方向來對西方具有無窮魅力。

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的報告幫助構建了這片遙遠而未知的土地絢麗多姿的形象。

從東方，通過絲綢之路，奢侈品、寶石、珍珠、香料、烏木、五顏六色的絲綢與花緞源源而來。它們越過了邊界，使羅馬的女士們可以包裹在透明的面料中，展現自己的魅力，古羅馬的老普利尼這樣寫道。

前往東方尋找“天堂”，最有名的冒險家是威尼斯的馬可波羅。1275-1292年之間，此冒險家曾在蒙古朝廷（元朝）居住。他寫下了《馬可波羅遊記》。這本書記載了令人目炫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它成為了它那個時代的暢銷書，並豐富了東方的神奇。

然而，到了1368年，中國的皇位又回到了漢人的手中，開始了著名的明朝。它關閉了與外界的聯繫。“城外為番夷之地”。這是新當

* 2012年3月15日在獨立宮的演講。這是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辦的慶祝葡萄牙抵達中國和東南亞地區500週年系列演講之一。演講主題以1996年由路易·努內斯導演的《諒解檔案》電視系列節目為基礎。當時演講人為主持人和合著人之一。另外一位合著人是安文哲。節目曾在澳門、葡萄牙（葡萄牙廣播電視台1頻道、葡萄牙廣播電視台2頻道、葡萄牙廣播電視台國際頻道和葡萄牙廣播電視台回憶頻道和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系列主題是澳門歷史，分為12集，4大主題。每個主題3集：想法（神話與現實；蓮花地；東方的咒語）；對比（基督徒區與華人區；權利分治；中國的優勢）；權力（葡萄牙當局的確立；葡萄牙統治的建立；正式承認主權）；外交與諒解（儀式與形式；大型使團；我們在東方書寫的一頁）。

以此12部紀錄片為基礎，安文哲、何思靈於1996年出版了《諒解檔案——澳門史的一種文化視野》。2009年由歐維士基金會在葡萄牙出版了第二版，《諒解檔案》（歐維士基金會/調查出版社聯合出版）。

** 澳門歷史問題研究員、出版家。

政者的座右銘。儘管如此，仍然沒有能夠阻止朱棣皇帝在十五世紀中葉，派遣鄭和船隊訪問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廣大區域，宣揚國威。

幾乎在同時，歐洲小國葡萄牙，通過海上發現航行，描繪出了非洲的輪廓，繞過了它，抵達了印度、馬六甲和澳門。

自從葡萄牙人在這塊小小的飛地定居之日起，中國的形象開始通過每天連續不斷的觀察構建起來。

東方的咒語

路易十五的情婦和顧問蓬巴杜夫人文質彬彬，很高興在擺滿中國物品的大廳中，接待朋友：

“龐巴度夫人收到了來自江西的一套有她紋章的中國瓷器……織品重現了中國的樣式。時髦的多色段子是1732年開始的……傢俱上的是中國清漆。

英國是首次在皇家植物園‘邱園’中模造中國園林的，而且是浪漫花園的起源……每一位大人物，或大金融家都有一座‘華亭’。”¹

這便開創了“中國風”時代。此種風格的靈感來自中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藝術和建築。18世紀，在歐洲各個宮廷風靡一時。瓷器、屏風、漆器、傢俱、絲綢、錦緞和畫卷為上層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大廳形成了一種異國情調的氛圍。

19世紀的浪漫主義也運用了異國情調的風格。

東方，作為一種“奇妙世界”，出現在人們面前，向人們提出了新的挑戰：對冒險的追求或測試一種夢想的願望。多少人開始尋找這個神話般的世界，尋求情感或找尋生活的意義。

我們的慕拉士，不僅愛上了澳門和中國，還愛上了日本。在他看來，都是充滿淒涼與痛苦的國度，通過為我們留下的寶貴著作，向20

1. 弗雷德里克·莫羅：《歐洲的擴張（1600-1870年）》，聖保羅大學，1980年。

世紀的葡萄牙人介紹了日本。“對於我來說，如果未得到日本太陽的照耀，乾脆別再活下去了。”

詩人、散文家、思想家、中國藝術收藏家和鑑賞家文第士是第一位研究道家哲學的葡萄牙學者。他還是一位關注時事的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質詢了葡萄牙政府，指責它應為20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澳門城市因逐步失去特色而負責：

“以前存在或是已被摧毀的典型的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建築。我們的城市在遠東是無與倫比的。一個值得一看與仔細觀賞的城市。可今天我們的城市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風景如畫的景色、不再有魅力、平淡無奇、不倫不類。

我記得，我曾看到過和聽到過外國人讚賞它。”²

庇山耶是澳門利宵中學首位哲學教員。他喜歡收藏中國藝術品，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他崇拜中國古代刑法崇高的正義和仁慈的精神。在他看來，他認為中國刑法是歷史留下來的最驚人的豐碑之一。他還是一名溫文爾雅的法官和令人震撼的象徵主義詩人。他為我們留下了《滴漏》這部無法克隆、充滿罕見敏銳的詩作。正如芭芭拉·斯巴佳麗說的那樣，這部作品使他成為了葡萄牙語文學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和歐洲象徵主義最高的代表之一。

蓮花地

無疑，耶穌會會士是聰明的傳教士。自16世紀以來，澳門成為了他們學習漢語之地。羅明堅是第一個從師一位中國畫家學習漢語的傳教士。他一邊畫畫，一邊書寫和朗讀相應的漢字。短短一年多裏，羅明堅學會了一萬五千個漢字，開始研究哲學家孔子（公元前575-479）的教誨。孔子學說的基點是傳統的“孝敬父母，崇拜祖先”，這是認識和了解中國人民的核心，有許多其他耶穌會士繼其之後，我指的是葡萄牙人徐日升，他是位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和音樂家。他

2. 文第士：“文選”，《澳門消息報》，第1卷，1949年。

把歐洲音樂介紹到了中國，他曾出任康熙皇帝的譯員，參加了尼布楚條約（1689）的談判工作，這是中國與歐洲列強，具體說是俄羅斯帝國，簽訂的第一個條約，里斯本澳門科學及文化中心對徐日升的著作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與推廣。

除了耶穌會士，中國知道，帝國以外，還有其他的國家掌握最有用的知識領域。這對於文明進步，是不可缺少的。通過耶穌會的信件，歐洲人已經深深著迷，知道世界上有其他文化中心，能夠與他們並肩並互相影響他們。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說：

“我們中間，無人相信，世界上會有一個比我們更完美的道德、更先進的處事原則的國家。東方的中國使我們驚醒。至於哲學實踐，歐洲人遠遜於中國人。”³

但其他傳教士，如道明會和奧古斯定會，基督教信仰是獨一真神和不能包容其他文化，他們無法接受把耶穌會捍衛和實踐基督教教義來適應中國本土文化。對於他們來說，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國教徒應否認祭祖和尊孔，從而誕生了臭名昭著的中國儀式之爭。耶穌會的戰略以失敗告終，耶穌會傳教士通過1692年頒布的康熙容教令打開的大門又被關上了，容教令本來可以保證天主教徒的信教自由，保護了傳教士和教堂。

康熙皇帝於1722年去世後，他的兒子雍正禁止了基督教，下令將各省（北京除外）傳教士驅逐至廣州，將教堂改為學校和醫院，並限制了耶穌會士的活動，僅僅使他們降到了科學家的地位。

如果我派遣一大批佛教僧侶去歐洲將你們皈依佛教，你們的統治者會如何反應？

於是，耶穌會士自16世紀末開始執行的以文化靠攏的執著和耐心的工作完全失敗了。

眾所周知，這個問題只有到1939年由教宗Pio十二世宣布中國基督徒尊孔和祭祖為合法後才解決。

3. 萊布尼茲：《論中國自然神學》，科利柏利，1991年。

基督徒區與華人區

一直以來，澳門地區被默認為兩個社區之間的空間。

一方面是城內的基督徒區，氣勢宏偉，有教堂、豪門大院、城堡和在南灣附近的諸如仁慈堂和議事亭之類的機構，一切宛如葡萄牙的任何一座城市。

另一方面是城外地區，它形成一個扇面，向內港延伸，這便是華人區，有寺廟，內港生活的喧囂及市集的繁忙，狹窄蜿蜒的街道鱗次櫛比……，形狀各異，望去眼花繚亂，無數的木杆、木板、晾曬的衣服、繩索和各種各樣的堆在門面或街上的器具，人口極高的密度……，商業區和住宅區之間缺乏隔離……將這個巨大住宅區變成了散發著麝香、鴉片、清漆，尤其是魚氣味的地方，這一切在潘日明神父筆下有形容。”⁴

在葡萄牙人獨家經營時，他們所從事的海上貿易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在廣州港購買絲綢，然後交換日本白銀。正是這項初期的活動為澳門的構建創造了條件。

澳城一分為二，從政治層面來說，符合權利的分配。

中國人聽從澳門所在的香山縣官員的管轄。

葡萄牙商人通過中、日航行甲比丹末，與葡萄牙王國保持政治及機構紐帶，並從1623年起，通過受制於果阿副王的兵頭或總督，與葡萄牙王國保持關係。

議事亭創建於1583年，由六位選出的人士擔任：三位市政委員、兩名普通法官和一名檢察官。直到19世紀，這是由葡萄牙人在澳門本地行使的最高權力機關。檢察官負責同帝國當局的聯絡。

清政府行使主權

儘管清政府已經承認管理澳城的議會方式，官員很快就開始加強對澳門事務的管理。在18世紀中葉幾乎實行全部主權的管理。

4.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

我們來看看康熙的情況。他在1662至1722年（其逝世之年）之間，統治著北京的皇位。

1685年，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這位皇帝向外國人開放了廣州港，從而結束了葡萄牙人的貿易專有權。

1688年，在澳門港設立了中國海關，對貨物徵稅。官員們強調說：

“對利潤的渴望可以引發擾亂。要監控行為，並防止中國不法分子與外夷，為金錢所驅使，同出一氣而致使問題叢生。”⁵

1698年，將澳門的商船隊規定為25艘額船，而且給予嚴格的稽查：登記證書、舵手名、船員名、商人名及出入港時間來控制貨物。損壞的船只可以更新，但要使用同一登記號碼。擅自建造船隻者，將受到懲罰。當局監管不利，也將受到懲罰。

其後，雍正皇帝在1723到1735年之間統治中國時代，仍然對澳門的“外國人”實行嚴格的控制措施。

1732年，這位皇帝在南灣設立了另外一個新的中國海關，並規定未經許可，不得新建房屋，僅允許修復舊有，新建必須取得管轄澳門官員的批准。

這種管理也擴展到了宗教領域。

“澳夷，即葡萄牙人，篤信天主教。但他們不能以其教誘使華人入教，傷風害俗，官員及地保需逐室搜查，以防止華人入教。”

乾隆皇帝在位期是在1735到1796年之間。1796年，當他退位給他的兒子嘉慶時，中國當局的管理也擴展到了司法領域。

澳門當時遵循雙重法律和管轄權的原則。

1587年的“判事官法”規定，判事官只聽取葡國公民投訴，即葡萄牙的法官——不得干預香山縣令議對華人社團內政，司法管轄權。“朕命令：上述判事官不得干預該居民點中國官員對華人和閩南人的管轄權。在居民之間互告案件中，完全遵守中國法律。在葡萄

5. 林頓：《轉型中的中國（1517-1911年）》，紐約，1969年。

牙人和華人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若超越判事官的權限，判事官應向果阿上訴。若刑事案件涉及華人，判事官應將案件交給中國官員審理。”1736年，兩廣總督又在澳門派駐了一位左堂，或稱望廈官員，對華人擁有刑事司法管轄權和警察的權力。

行使司法權一直是兩個民族衝突的焦點。這個世紀越發加重。葉士朋教授指出：“中國官員要求審判一切涉及華人的刑事案件，即使疑犯是葡萄牙人。葡萄牙當局認為，這種態度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疑犯是葡萄牙人。”⁶

1747年，若些抵達澳門，出任總督（1747-1749）。他試圖扭轉這一局面，但直至19世紀，在鴉片戰爭造成的中國內部很虛弱的情況下，葡萄牙才能加強對澳門的統治。

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建立

隨著19世紀的自由主義，強調了集權和政治一體化，傾向於把葡萄牙帝國的海外部分置於相同的政治和法律層面。1844年，唐娜瑪麗亞二世下令成立獨立於葡屬印度的澳門、東帝汶和索洛爾省。次年，頒布澳門港口的所有貨物免稅。

為了執行這些指令，亞馬勒被任命為總督。他將在兩條戰線上採取行動：

對於澳門葡人：他取消了議事亭要自治的異想天開，結束了其成員選舉的制度，開始按照個人和政治信任的標準任命，並收回了檢察官處理清政府事務的權力。

對於中國政府：

——結束了葡萄牙人從16世紀居澳以來，每年支付的500兩的貢銀；

——完全佔領了氹仔島和路環島；

6. 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澳門基金會，1995年。關於司法執行的糾紛，可見瑪麗亞·海倫·嘉模著：《鴉片商——乾隆時代的澳門》，塔基德出版社，2012年。

- 取消了中國官吏對華人的刑事司法管轄權；
- 強加給了中國官員來澳人員外國代表的地位；
- 結束了船隻丈量 and 付款；
- 將葡萄牙的管轄確立至關關，下令建設一條從澳城城牆至這一關口的道路。

這一政策導致中國的強烈反應。該總督最終於1849年8月22日遭暗殺。

但亞馬勒為澳門的一個新的政治地位的實施留下了一個強勢的局面。

正式確立霸權

1861年，吉馬良斯總督在一個發送到葡萄牙的報告中主張：

“葡萄牙宜與中國簽訂一項條約。不僅僅使我們有權享受最近簽約列強得到的好處，而且可以使澳門殖民地同清政府不清的關係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

這位總督被里斯本任命為駐華全權公使，以開始談判。該條約最終於1862年在天津簽署。

定於兩年後換文批准，但因為第9款解釋上的分歧，該條約從未換文。

該條款的葡萄牙語文本稱：

“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應系或旗、或漢四五品人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

清政府大使級的談判代表未接受它，並要求不在澳門設立中國領事，而是派駐一位有權向來澳門港口貿易的華船徵稅的官員。葡萄牙方代表阿穆恩斷然拒絕了中國的解釋，返回了澳門。

需要等待葡萄牙人要求有更有利的條件，幾年後終於等來了。中

國決定增加鴉片進口關稅，以平衡其財政。她需要香港和澳門的合作。如果澳門同樣做的話，香港接受打擊鴉片走私貿易。澳門只接受合作，以換取對葡萄牙霸權的承認。

羅沙在離開澳門總督的職位後，被任命為負責外交談判的全權公使。最終於1887年3月在里斯本簽署了《中葡里斯本草約》，條款如下：

1. 定准在中國北京即議互換修好通商條約，此約內亦有一體均沾之條。
2. 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
3. 定准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
4. 定准由葡國堅允，洋藥稅徵事宜應如何會同各節，凡英國在香港施辦之件，則葡國在澳類推辦理。

當年12月，在北京簽署了《1887年條約》，基本上確認了《中葡里斯本草約》的主要內容。次年批准生效。

清政府首次承認葡萄牙對澳門的霸權。但這是一個有限的霸權，因為葡萄牙不經中國首肯，不得將澳地或屬澳之地自由讓與他國。

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狀況。

澳門20世紀

本世紀初，滿清權力倒臺，1911年成立了民族主義頗重的民國。1937年，中國遭日本侵略。1941年，在珍珠港攻擊美國艦隊後，歐洲戰區的事態已經全球化，擴展到遠東。中國與她的敵人日本拼殺，站在了戰勝國一邊。這大大提高了外交政策的尊嚴，使深厚的民族主義自豪感復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966年，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澳門發生了“12.3”事件。為維護葡萄牙在澳門的繼續存在，澳門政府不得不採取了妥協的態度。“4.25革命”之後，當時制

定的非殖民化政策為葡萄牙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之間達成一個關於澳門問題的協議帶來了希望。

《1976年憲法》承認了澳門地位的特殊性：

“澳門為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由一個適合其特殊情況的章程所管理。”

隨著毛澤東於1976年的逝世，中國果斷地進入向國際社會政治開放的領域。1979年恢復了自1949年以來斷交的葡、中外交關係。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其目的是收回香港、澳門和台灣。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要理解由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概念。

1987年，在北京簽署了《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次年換文批准。它規定了1999年12月20日移交主權。

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於1993年由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此文件確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儀式與形式

中國朝廷的禮儀嚴格而莊嚴，西方人無法了解。孔子的教誨是一種複雜的防禦機制，讓帝國不受外界的影響。

葡萄牙首次對天朝派出的使團，因了解甚少，準備不足，無法理解中國錯綜複雜的文化，所以它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的第一任大使皮雷斯很熟悉東方的商業網絡，是一位著名藥劑師。他寫下了《東方簡志》，詳細論述了遠東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人類學方面的地理知識。他的任務是鞏固1513年歐維士在東涌所受到的接待。但事情並不如此。費爾南·佩雷斯·安德拉德率領的艦隊，於1517年離開馬六甲。到達廣州時，他開炮致意，華人為之譁然。地方當局遲遲不允許皮雷斯赴京，武宗皇帝在旅途中死亡。這迫使我們的大使返回到了廣州。在那裡，他與他的隨行人員被捕下獄。皮雷斯走完了他的一生，

或許是死在廣州。其下獄和死亡仍然籠罩在一片神秘之中。

對於一國之主的天子而言，他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接待欲與其平起平坐的外國代表是不可想象的。皇帝只接見貢使團。進貢意味著低下的地位。

17世紀（1667-1670年之間），在康熙大帝期間，瑪訥撒爾達聶代表阿方索六世出使中國朝廷，必須證明澳門對新王朝的尊敬和減輕1661年禁海令的負面影響，這一法令禁止沿海城市的海上貿易，以切斷沿海居民對反清勢力的支持。由於葡人以此行業為生，必須快速解決這一困境，以免他們陷於孤立，所以他們急於要和清王朝會面。瑪訥撒爾達聶獲准赴京，在京廷的耶穌會神父到天津迎候，其餘的路程走大運河。同時，為他講授中國禮儀複雜的規則，一艘載著外交使團的船上寫耶穌會神父精心挑選的詞句：

“葡萄牙國王的大使進賀中國皇帝。”

瑪訥撒爾達聶意識到形象的重要性，因而他是座著驕子，穿著華麗入城的。通過皇帝的翻譯耶穌會會士南懷仁，有機會向皇帝講述了澳門的困難。實際上，皇帝並沒有頒佈禁止海上貿易的法令。

返回途中，大使逝世於中國大地。康熙為廣東下旨：

“朕令爾等向葡萄牙國王來朝，逝世於此的大使的遺體致祭祀。”

在他統治的末期，康熙向里斯本朝廷派了一位大使。他的使者是葡萄牙耶穌會的張安多神父。他著中國官服。他來的目的是向若昂五世國王解釋“禮儀之爭”問題在中華帝國引起的諸多不便，要求葡萄牙國王予以干預。但康熙在1722年逝世，這使得葡萄牙人張安多神父失去了中國朝廷代表的地位。

雍正繼位後，因為禮儀的問題，朝廷與傳教士之間存在過的良好氣氛不復存在。1725年，若昂五世國王應澳門議事亭之請，派遣麥德樂出使中國朝廷。在澳門稍事逗留後，前往廣州，然後北上至京。船上打著以下的字符：

“大西洋國遣大臣恭賀皇帝。”

朝廷客套的禮儀並未能掩飾他對傳教士作用的毫不妥協。外交使團未能達澳門人迫切的需要。在唐若澤在位期間，於1752年再次派遣巴哲格出使京廷。在中國官員逼命的干涉下，澳門正經歷著最困苦的时刻。

乾隆皇帝話語友好，贈送了一象徵幸福的翡翠，還送了一盒折疊成書的親筆字畫，但澳門的生活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中葡諒解

歷史是一種了解和看待的方式。有時，這種理解很微妙，是一個有意義來描繪葡萄牙和中國之間，通過澳門的長期和日常接觸的概念。但也有分歧，誤解和不理解。一些是通過武力，一些是通過有時屈辱的讓步來解決的。長期以來，有些是由在北京的耶穌會士斡旋而減輕的。耶穌會士是諒解外交的大師，入教華人的代言人也扮演了語言翻譯的角色。他們責任重大，在同帝國的交往中，是澳門的“臉面”，我們更熟悉的是澳門華務廳那些勤勉的口譯員所作的貢獻，是這個機構培養了雙語人員。

在此，可列舉一些名人，如伯多祿、左治和高美士。

正是這些漢學家超越了他們公務的範圍，出於純粹文化的快感，為我們帶來了許多中國文化知識。

這一文化遺產以翻譯經典和研究為主，使人走近了一個當時無法進入的文明的輪廓，但語言的障礙是無法逾越的。

正是這種實際上行政的意義多於文化的意味的漢學，在本地不斷存在了近500年，畢竟，彼此之間雖有不了解，卻未發生過重大的事故。